

芥川龙之介笔下的“忠臣藏”*

◎ 刘东波

摘要：芥川龙之介的小说有诸多分类法。常见的有“王朝物”“切之丹物”“江户物”等分类。《大石内藏助的一天》这部小说，可归于“江户物”的类别。借助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某个著名历史人物来进行小说创作，是芥川常用的一种创作手法。本作品中所描绘的大石内藏助，完全颠覆了读者心中固有的“忠义”“视死如归”等形象。芥川用渐进的手法，极其细腻地刻画了完成“义举”之后内藏助的“不快”“无奈”“寂寥”。本文着重探究芥川创作阶段参照的历史材料，剖析其渐进式描写手法。

关键词：赤穗事件 复仇 大石内藏助 寂寥

一

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大石内藏助的一天》，于1917年（大正六年）9月1日发表在《中央公论》杂志上。后收录在《烟草与恶魔》（1917）、《傀儡师》（1919）等作品集中。小说讲述了大石内藏助在与其同伴完成复仇行动后，被禁足于细川家等待幕府处理时的一天。诸位家老武士围炉小憩，一方面对江户城中发生的斗殴事件论道道长，一方面对赤穗藩的背盟者展开猛烈的抨击。之后话题竟落到大石内藏助那里，大家高度赞扬内藏助蛰伏期间的“装疯卖傻、放浪形骸”。七嘴八舌的议论让内藏助的内心生出一系列变化。内藏助最终借故离席，独自在廊下远眺庭中寒梅。

大石内藏助又称为大石内藏助良雄。相比“大石内藏助”这个名号，“忠臣藏”更加为世人所熟知。他的忠义、勇猛还有视死如归的精神深入人心。可是，《大石内藏助的一天》没有吹捧和赞扬。相反，内藏助的心境从“满足”转变为“不快”“哀愁”“寂寥”。芥川在本作品中创造出了一个与社会共识相违背的“忠臣藏”形象。关于这个特殊的设定，有很多问题需要探究。

关于本作的出典，石割透与奥野久美子在各自的论文中做了比较研究。^①他指出，芥川在创作时参考的资料有福本日南的《元禄快举录》（启文社明治四十二年版，后简称《快举录》）和《堀内传右卫门觉书》（五车楼书房明治39年版，后简称《觉书》）等。笔者调查发现，有一部关于赤穗事件的资料集里面收录了江户时代关于大石内藏助复仇事件的各类

* 本文为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助成基金项目（课题编号：18J1197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资料，其中也包含《觉书》。这部资料集就是《赤穗义人纂书》。此书成书于1851年（嘉永四年），1910年（明治四十三年）由国书刊行会出版发行，收录了赤穗事件研究的基本资料共158件。

奥野久美子在其论文中提到，“芥川除了利用出典的设定之外，也借用了一些与本作品的时代设定相接近的表现手法”。比如关于细节描写，奥野提到，本作品中出现的小道具的描写参照了井原西鹤的《好色一代女》中部分内容。那么，芥川在塑造内藏助的人物形象时，除上述先行研究中提到的文献外还参照了哪些资料？芥川所生活的大正时代，人们对于“忠臣藏”的理解又是如何？此类问题还有进一步考察的必要性。本文着重探究、比较作品及其出典，通过分析内藏助心境的变化，分析芥川笔下刻画出反常识“忠臣藏”的原因或历史背景。

二

本作品聚焦于大石内藏助生命后期的一个冬日，生动地描绘出主人公孤独惆怅的心境。作品中提到的“复仇之快举”应指历史上著名的赤穗事件。^②1701年（元禄十四年）3月14日，赤穗藩主浅野内匠头于江户城松廊下将吉良上野介刺伤，引发纷争，随后浅野受命即刻切腹，领地也被一并罚没。翌年12月14日，以浅野家老大石内藏助为首的一行旧藩士，攻入吉良宅邸并取得吉良首级。随后众藩士被捕，分别禁足于细川、松平、毛利、水野四家之中。

对于这些旧藩士的处置，幕府上下讨论许久未能轻易做出决断。他们的行为到底应视为忠义，还是犯罪？上到幕府将军，下至平民百姓都被卷入，掀起了江户时代最大的一场争论。最终，旧藩士一行被定刺杀幕府高官之罪，于元禄十六年二月四日，被判处全体切腹。

此次事件之后，以“假名手本忠臣藏”等为名的戏剧、文学作品等席卷民间。据统计，迄今为止以“忠臣藏”为题材的作品，在日本传统净琉璃、歌舞伎中保持着最多演出场次的记录。^③赞扬他们义举的民间行为，时至今日仍在持续。笔者于2018年12月赴东京泉岳寺（大石内藏助等人的墓园）做了实地调查，虽是工作日，祭拜大石内藏助等藩士亡灵者却络绎不绝。泉岳寺每年4月和12月都会举办大型法会和纪念活动。长期以来，“忠臣藏”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深深嵌入这个民族的记忆。即使是现在，也有很多以“忠臣藏”为题材的电影或电视剧在上映，如电影《最后的忠臣藏》（2016）等。针对这个现象，日本的文学研究家关口安义如此说道：

忠臣藏一词，本就出自“假名手本忠臣藏”这一传统净琉璃脚本。随时代变迁渐渐成为赤穗事件的一个代名词。在芥川出生的1892（明治二十五年），忠臣藏已世人皆知的故事。复仇行为被称为义举，参与行动的四十七人被称为“义士”。四十七人对主君的忠臣，与明治天皇制国家的形成毫无冲突。反而，甚至可以说忠臣藏的传说是政治催生的产物。^④

芥川龙之介童年在东京本所区小泉町15番地(现墨田区两国3丁目22番地11)度过。这个地方,正好在当年赤穗藩士们成就他们快举的吉良宅邸附近。关口在其论文中提道:“抚养芥川成人的伯母富纪非常热衷于净琉璃和歌舞伎,经常讲‘忠臣藏’的故事给幼时的芥川听。”因此,芥川对于家门口发生的这个历史故事抱有一定的兴趣是十分自然的了。

根据以上内容可以推断,芥川是一位对“忠臣藏”抱有极大兴趣的作家。最初指出本作品的出典是《觉书》和《快举录》这两部论著的是吉田精一^⑤和三好行雄。之后,石割透和奥野久美子又对其进行了详细的对比分析。三好在其研究中,如此说道:

攻入吉良宅邸完成复仇后,大石内藏助被囚江户高轮细川家院里。大石细川家被囚生活的描写,是根据当时负责看护大石的细川家家臣堀内传右卫门所著《觉书》写成的。《堀内传右卫门觉书》又被称为“赤城义臣对话”,因是大石等极为亲近之人所著,翔实记录了右卫门当时所听、所见、所想,故而被《续史籍集览》、国书刊行会刊《赤穗义人纂书》等书籍收录。此外,福本日南的《元禄快举录》等,也应有所参照。而芥川有机会参照《赤穗义人纂书》第一卷所收“赤城士话”等文献资料。^⑥

三好行雄在其论文中最早提出了芥川可能参照过的一系列出典资料,但《赤穗义人纂书》一直没有受到关注和研究。大多数研究者将目光聚集在《快举录》一书。《快举录》于明治四十二年刊发,之后广为传阅。明治四十二年初版后不到两年就出了袖珍版。针对此事,松岛荣一评价说,“此书不同凡响,堪比洛阳纸贵”;“说此书直接影响了战前日本近代社会的‘忠臣藏’评价,也不为过”云云。^⑦那么,《快举录》描绘的大石内藏助到底是什么形象呢?下面摘录其中两段来说明。

我以为从古至今评价英雄不外乎以下四个标准。其一是英雄。其二是君子。其三是既英雄又君子。其四是既君子又英雄。历史中的诸位英雄大概都在此之中吧。大石内藏助其人,属于既君子又英雄之类。察其天性,可知其人之宽厚,处世之清白。而且,此人内心有毅然而不可犯之威严。(《快举录》三十二)

内藏助天赋异禀,超凡脱俗。学问武艺不在他人之下,堪称一等士大夫之典范。正是所谓的文武双全之士。然而,其平生极为谦逊,既未见自夸又不显其能。话虽如此,却绝不是什么迂腐之人。善于饮酒,偶尔也会放荡不羁。总而言之,真是一位奇人。(《快举录》三十五)^⑧

如上所示,《快举录》中描绘出了内藏助“既君子又英雄”和“放荡不羁”的人物形象。和本作品中的大石内藏助稍做比较即可发现,此出典中的形象和本作品描绘出内藏助外在形象是一致的,但是本作品从另一个侧面又对其人物形象做了刻画,即内藏助内心世界的写照,这在任何出典资料中是不存在的。下面,引用作品原文的内容来加以说明。

毫无疑问，他曾无怨无悔生活在记忆的所有放浪生活中，也曾在放浪的生活中完全忘却复仇义举享用短暂的惬意瞬间。他是一个极端诚实之人，却自我欺瞒否定了这个事实。对于明了人性真谛的他，那当然是做梦未敢想象的悖德之举。因此当人们盛赞自己，或将自己所有的放浪行为说成是实现忠义的手段时，他便会感觉到不快和负疚。^⑨

本作中内藏助因不得已“装疯卖傻”被赞扬，继而“仅存于胸间的那缕春风，眼见得拂面而过”，直至最后“漠然地叹气”。芥川在这里刻画出一位“叹气”的内藏助，这点在《快举录》中找不到与之相符的内容。也就是说，本作中刻画的内藏助，其外在确实参照了《快举录》的内容；但是内在方面，芥川应该是在参照其他资料的基础上创作的。值得注意的是，芥川本作中描绘的内藏助，和广为人知的“忠臣藏”之间有一定距离。他不像《快举录》或是戏剧写本中描绘的那么完美，反而是一位因周围称赞感到不愉快、继而面露愁容的人物。那么，芥川是不是通过本作品试图向读者展示大石内藏助不为人知的一面呢？针对这个问题，接下来将结合本作品的内容和新的出典资料，对芥川笔下的“忠臣藏”进行分析和解读。

三

笔者通过对作品文本的分析，将大石内藏助心境的变化划分为四个阶段。此外，将每个阶段的变化原因归纳为三个“打击”。

- (1) 静坐席上，面露满足之情。
- (2) 听周围议论，满足减退几分←多余的闲话(江户城中打架斗殴事件)。
- (3) 满足再失几分温度，不快←众人对背盟者的批判。
- (4) 满足被风吹尽，心生反感←蛰伏期间，装疯卖傻的往事。

首先，简单分析作品原文中的“满足之情”。在本作品中的内藏助，最开始围炉而坐的时候，面露“满足之情”。

他回想起当初的山科与圆山谋反。当时的苦衷仍历历在目。不过所有的人，现已各得其所。

……党羽们皆已到达了指定地点。然而此举并非单纯的复仇之举。诸人以近乎一致的形式，成就了他的道德要求。他体味了道德实现的满足。那般满足，无论从复仇的目的上看，还是从复仇的手段上来看，都没有丝毫良心的愧疚或荫翳。对他而言，显然没有比这更大的满足了……

内藏助感受着源自火盆的温暖，心中充满了“满足之情”。但是，与此同时“当时的苦衷仍历历在目”。这段内容中出现的“苦衷”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其实，作品中已经通过“焦虑与筹划”“余党们的蠢蠢欲动”“山科与圆山谋反”等关键词做出了相关的背景解释。

从这些线索中得知,此处牵动内藏助心绪的是在赤穗事件发生之后的一系列事情。根据山本博文和松岛荣一的研究,赤穗藩在接到幕府处死家主的命令后,内部发生了极其激烈的争论。其争论的核心就是应该忍气吞声还是奋起反抗。^⑩笔者根据上述先行研究,对赤穗事件发生到最后的复仇行动的过程以及赤穗藩内部的争论、行动做了简单的梳理。

- (1) 据城死守(多数家臣的意见),集体追随家主殉葬以示抗议(内藏助的主张)。
- (2) 权宜之计,交出赤穗城。
- (3) 立即采取复仇行动(激进派),伺机而动(内藏助)。
- (4) 举行山科会议(做出静观其变的决议)。
- (5) 家主胞弟浅野大学被送入广岛藩浅野家(东山再起计划覆灭)。
- (6) 举行圆山会议(决定采取复仇行动)。

如上所示,本作品中“焦虑与筹划”“余党们的蠢蠢欲动”“山科与圆山谋反”等描写,都和史实一致。内藏助本来心中最大的期望,应该是等待时机复兴赤穗藩。后因唯一的期望破灭,才与众人走上复仇之路。也就是说,从结果来看,对内藏助而言,虽然成功为家主复仇,但复仇之举绝不是最理想的对策,也不是他的初衷。因此,上文中提出的“苦衷”,应该是继藩主被赐死之后,对赤穗藩的复兴而感到的绝望。

接下来,对造成内藏助心境变化的三个“打击”进行分析。第一个是江户城中发生了全城热议的打架斗殴事件。江户城中发生的这个事件和内藏助“风马牛不相及”,但故事中的某些因素,还是影响到了内藏助的心境。

然而此时的这件事,却在他领受了极大满足的心中,突然播下了恼人的种子。也许,他那满足的底部是悖理的。对于那般行为与结果的完全肯定,或亦带有自私的性质。在他当时的心中,当然还没完全涉及那样的思想解剖。他在春风之中感受到一丝冰冷,仅觉得有些许不快。

对于这个市井流言,作品中虽用到了“悖理”一词,但此时的内藏助只感到“些许不快”。关于本作,芥川留下的一部草稿^⑪中写道:“在这一年中,他(内藏助)一直怀着一种罪恶感在生活。”不论是“悖理”还是“罪恶感”,从这些表述中可以看到,芥川对赤穗藩士们的“快举”抱有和《快举录》不同的看法。

芥川在本作品中,还穿插了两个小故事。一个是“染坊匠人”和“米店掌柜”的斗殴事件。另一个是唐土(中国)一勇士为主报仇、吞炭致哑的故事。芥川将这两个小故事和赤穗藩士们的“快举”对比,对他们行动的合理性提出了思考。宫泽诚一在其关于赤穗事件的研究论文中指出:“事件发生的当时,像子报父仇这样,晚辈为亲人长辈报仇才是正统。然而,关于本事件是否能纳入传统意义上所指报仇这一范围之内,引起了激烈的争论。”^⑫这个问题存在于特定的时代,与当时的幕藩体制以及武士的生存方式有着密切的关联。

在净琉璃、歌舞伎的世界里,内藏助一行的行为被称为“义”,且长时间都在提倡这种精神。但是,与此截然相反的主张也是存在的。在《赤穗义人纂书》一书中,收录了一篇名为“大石论七章”的策论文章。其作者牧野直友在文中明确提出了“良雄等此行也,非义

也，乱也”的主张。牧野引用了大量的儒家经典中关于“义”的表述，论证了赤穗藩士一行人的行为为“乱”。针对牧野的这一论断，当代的汉学研究者田中佩刀说：

从数字方面来比较义士否定论和肯定论（即赞美义士行动的论调）的话，肯定一方占多数意见，而否定一方为少数意见。但是，由此可以推测，在那个全社会都在赞美义士行动的氛围里，有人敢于提出否定意见那是相当需要勇气的。正因为有如此背景，即使时至今日，由于本来就是少数意见，因此否定赤穗义士行动的意见几乎不为人知，这是实情。^⑬

因此，根据上述内容，我们是否可以推断出芥川的真实意图呢？芥川在本作品中塑造出的内藏助，与深深扎根于读者脑海中的形象有一定距离。本作通过“悖理”“罪恶感”这些用语，刻画出了充满反省意识的大石内藏助。这才是本作品的灵魂，也是仅存于芥川笔下的大石内藏助。但这仅是第一个“打击”营造出的氛围，内藏助的心境只是变得“些许不快”，并没有产生强烈的反转和冲突。芥川将草稿中相关于“罪恶感”的叙述删除了，同时又加上了其他两个“打击”，继而让内藏助的内心世界发生渐进式的变化。通过接下来的“打击”，使内藏助的心境逐渐向“哀愁”“寂寥”的方向转变。

第二个“打击”，指的是周围人对临阵脱逃那批人的批判和指责。在赤穗藩主被处死、领地被幕府收回的时候，有一批人中途退出了复仇同盟，因此，参与复仇行动的藩士们用“畜牲”“臭名远扬”“恬不知耻”来表达他们的不满情绪。然而，内藏助并没有和其他人一起去批判，而是“双手放在膝盖上，一副无动于衷的神情。呆呆地望着火盆里的炭火”。他此前内心拂过的那股春风，“却再次降低了几分温度”。本作品中的内藏助，为什么没有与众人一同批判背叛者，反而自己心生不快呢。针对这一点，借用田中研究成果的一些数据来从侧面进行分析。

当时赤穗藩的藩士，总共有 300 人。表明欲为主复仇的人有 118 人，采取行动潜入江户城的有 56 人，最终实际完成复仇行动的人数是 46 人。^⑭

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背叛者之中，有很多在藩里地位很高的人。其中，就有地位仅次于俸禄 1500 石家老大石良雄的人。^⑮

通过这些数字可以看出，赤穗藩中意欲抗争的人本就只有三分之一，最终背盟者也达到当初宣誓人中的一半以上。本作中内藏助对这些人的行为评价是“非常自然”。对他们毫无怨恨、唯有怜悯。这里的第二个“打击让内藏助的心情进一步沉重起来，并流露出“痛苦的表情”。

第三个“打击”，指的是众人提起内藏助在蛰伏其间，那些放浪形骸、装疯卖傻的往事。大家都在称赞内藏助的深谋远虑和隐忍，却不知内藏助也曾在那一段的放浪生活中，完全忘却了复仇义举，而享用着短暂的惬意瞬间。这一下，彻底抹去了内藏助内心的安宁，胸间那缕春风消散得无影无踪。此时的内藏助借故离席，独自来到廊下，眺望着庭中寒梅老

树。此时的静和帐幕内的动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另外,利用寒梅的馨香,将内藏助冷彻心底的孤寂准确地表达了出来。

结 语

芥川龙之介不仅是一位心思细腻的作家,更是一位敢于挑战传统观念的作家。芥川借用“忠臣藏”这一家喻户晓的故事作为本作品的基础,通过渐进式的手法,将大石内藏助一天中复杂的心境变化写了出来。透过本作中主人公的寂寥、无奈,读者可以隐约感受到笼罩于战后日本社会的低沉气氛。同时,芥川借用作品人物,将自己那种无人理解的孤独在本作品中准确地描绘了出来。

本文通过验证前人的研究成果,将《快举录》这一出典资料和作品原文做了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之上,找到了许多《快举录》里看不到的内藏助的人物形象,并由此分析了新的出典资料《赤穗义人纂书》。这部书中收录的“大石论七章”一文,虽是“少数意见”,但和本作中内藏助的人物形象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这部书也应列入本作品的出典资料,以便今后对本作品展开更加深入的解读分析。

此外,本文着重分析了本作中内藏助在四个阶段的不同心境以及直接影响每个心境变化的三个“打击”。本作品中的内藏助,确实是一个和社会共识背道而驰的人物。但是芥川通过娴熟的渐进式写法,不仅使内藏助人物形象的反转无任何突兀,反而更显自然。通过反转,芥川在本作品中描绘出了一个不为世人所知的“忠臣藏”。这也是本作品最大的一个特点。

注释:

① [日]石割透:《〈徘徊的犹太人〉〈两封信〉〈大石内藏助的一天〉——“传言”中的主人公》,《驹泽短大国文》1986年3月,奥野久美子:《芥川龙之介〈大石内藏助的一天〉的方法——以人物造型为中心》,《国语国文》2000年8月。

② 关于赤穗事件的原委,参照了[日]山本博文:《赤穗事件与四十六士》吉川弘文馆2013年版。

③⑦ [日]松岛荣一:《忠臣藏——成立与发展》,岩波书店1964年版,第46页。

④ [日]关口安义:《〈大石内藏助的一天〉论——对“寂寥”的探寻》,《近代文学研究》2007年1月。

⑤ [日]吉田精一:《芥川龙之介(国文学评传严书)》,1942年三省堂版。

⑥ [日]三好行雄:《芥川龙之介论》1976年筑摩书房版。

⑧ 此处出典的引用源自[日]福本日南:《元禄快举录》1909年启成社版,中文翻译为笔者拙译。

⑨ 本论文中,小说日语原文均参照《芥川龙之介全集》第二卷,1986年筑摩书房版。中文翻译采用魏大海译《大石内藏助的一天》,载高慧勤、魏大海主编《芥川龙之介全集》第一卷,山东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39-248页。

⑩ 见注②与注③。

⑪ 本作品的草稿,参照了《芥川龙之介全集》第21卷,岩波书店1997年版。第235页。

⑫ [日]宫泽诚一:《赤穗浪士一衍生出的“忠臣藏”》,1999年三省堂版,第93页。

⑬⑮ [日]田中佩刀:《关于赤穗义士论的考察—近世武士道论序说》,《明治大学教养论集》1987年

3月。

⑭ 关于赤穂义士人数是46人，还是47人，历史学界一直有争论。因一位名为寺坂信行的武士在行动结束后，没有和众人一起到达事先指定的集合地点岳泉寺。关于他的行为，是逃跑还是收到指令，没有定论，导致有部分学者将他不计入义士范围。因此，此处引用的内容中，田中佩刀将赤穂义士定义为46人。

（刘东波，男，1989年8月生，甘肃天水人，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近代文学，中日西域文学比较）